

云南客家文化研究会会讯第九期集刊

客 家 乡 情

叶智彰 主编

云南客家文化研究会
1998年6月25日

鸣 谢

本期云南客家文化研究会会讯印刷费蒙本会
副理事长何小虎先生全额资助。

谨此致谢

云南客家文化研究会

会讯编辑委员会

1998年6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客家研究	(2)
一、客家人界定刍议	(2)
二、客家三论	(6)
三、梅州客家迁徙及其经济综述	(10)
四、清代四川的广东客家人	(14)
五、客家语言和客家人的分布	(19)
六、客家人与中国近现代史	(21)
七、客家人与云南	(22)
第二部分 客家文化	(27)
一、客家谚语、歇后语	(27)
二、客家山歌	(37)
三、客家传统情诗	(41)
四、客家情歌的艺术	(45)
五、客家童谣	(46)
第三部分 客家人在云南	(49)
一、客家先民毛太华及其后裔在云南	(49)
二、《云南省志·铁道志》中述及的客家人	(50)
三、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校友在云南	(51)
四、我国灵长类学科领域的客家人	(54)
五、云南有色勘察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林涛初	(55)
六、客家山歌	(56)
七、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	(56)
第四部分 通报、通知、简讯	(60)
通告	(60)
为解决永久会址购房筹款办法	(60)
泰国客家奖学金发放情况	(61)
97 年度泰国客家奖学金获奖者名单	(62)
97 年度马来西亚客家奖学金获奖者名单	(62)
引线搭桥	(62)
接待来访简讯	(63)
三八客家妇女联欢活动	(63)
书画简讯	(63)
交纳会费情况通报	(64)
鸣谢	(64)
《会讯》征稿启事	(64)
会员名录 (续 5)	封三

第一部分 客家研究

一、“客家人界定”刍议

赖雨桐

何谓客家人？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客家人界定”这一研究课题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人不揣浅陋，提出一些肤浅见解，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诸前辈。

（一）秦代戍卒和迫迁之中原人的后裔有部分成为客家人，但不可能全成为客家人。

一些学者认为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统一中国后。据知，中原汉民大批南迁始于秦，但是，这首批南迁的中原汉人能否成为客家人？有多少成为客家人？就很值得研究。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 221 年），并吞六国，统一中原。为巩固南疆，发卒 50 万移民南越，在彼地开疆设郡。这 50 万兵丁，大多是赵、魏两国的丁男丁女。史载多抱定“一去不复还，留在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他们来自中原同一区域，说同一方言，一齐行动，一齐进占，一齐开基，披荆斩棘，随后，秦又将触犯刑律的人、被贬的官吏及不法商人遣送南越，（如史载秦“使治狱吏殖者，流放南越地。”又还给 50 万戍卒赐予 1.5 万人员为“士卒衣补”等等。

秦代戍卒迫迁之民确有一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如唐代进士刘瞻、韦昌明、宋代进士余靖等，都是粤北或龙川客家先民，在客属谱牒——《崇正同人系谱》中，均作客家历史文化名人收录，载入卷五《选举》中。

秦代戍卒和迫迁之民，决不可能都成为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他们虽留在岭南，但数传以后，往来无定，反复转徙，和岭南古越族或其他民族融合，先后形成岭南各具特色的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

湛江师范学院刘佐泉先生认为：“在南越国存在的 85 年间，因南北交通不便，天子鞭长莫及，故与中原隔绝多时。‘中县人’（泛指南下的中原汉人——编者）非但没有北归中原，而是在地广人稀的南疆，分屯各地要隘，垦殖开发，繁衍裔孙，成为定居南方的中原汉族各民系（包括客家民系）的起始先民。”^①此说明明确提出秦谪徙之中县人（中原人）逐渐演变成南方各民系（包括客家民系）。

深圳大学陈乃刚先生认为：“秦统一岭南时期，大批‘中县人’或因进军岭南，或因谪徙，或因经商而定居于以番禺为郡治的南海郡，‘与越杂处’在语言上很自然地产生了互相同化的现象。到了西汉初期，便较基本成型。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古越族语言属今壮侗语系。当时，‘中县人’是客体移民，在语言同化过程中，按着入乡随俗的惯性，多以学习古越族语言为主；古越族人为了与文化先进的‘中县人’交流，也主动吸收了中原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这样，便形成了以壮侗语为主体，融汇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粤语方言。”^②此说提出秦戍卒或迫迁之民，有一大批形成了岭南最早的民系——广府民系。

事实上，即使上面所说的一部分形成了“北江客人”，在历史上多次继续转徙，不少也流入广府民系地区，变成了广府人。据新编《南雄县志》记：“在中原人民南徙中，南雄珠玑巷以其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成为极其重要的南徙中转地。南徙人民先在珠玑巷驻足，然后再一次南

徙珠江三角洲一带，故那里的许多闻人望族，都把珠玑巷称为‘七百年前桑梓乡’。^③如明番禺屈大均、清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等名人，其祖先都来自珠玑巷。又据中山黄慈博先生《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称：“南宋末年，元兵扰攘之时，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氏族有 73 姓、164 族。”^④（这些氏族，原为粤北客家人，南徙至珠江三角洲一带，逐渐把客家话的语音与当地越人语音混合，变成广府方音。这些已变成广府民系的人，当然就不再是客家人了。据台湾黄麟书先生考证：“世称南海冼族为岭南人物第一家。……冼家由客话转为广州话，当在珠玑巷南迁之后，一如赵佗一族，为南海尉之后，且屠睢率五军，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郡，因此推断现行广州话，当为秦之戍卒与原居于南海郡之越人语言混合而成，亦似由客话与越人之语言混合而成。”^⑤可见，迁往岭南的这批中原汉人确实有部分形成了客家人，故本人赞同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之说。

（二）客家民系正式形成在元末明初时期

客家民系形成的时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中说：“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

台湾饶颖奇先生说：“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国后，曾遣大军戍守大庾，防止南蛮入侵，不幸传二世而亡。这些守兵遂留居粤北，不再言归，数传以后，生活逐渐安适，文化方面，因承中原之道，非常发达，唐宰相张九龄便是曲江客家人，研究客家民系的将这一支派称为‘北江客人’。”^⑥这一说法，比罗香林的客家民系形成结论推前了 500 多年。

台湾秦史研究专家黄麟书认为：“现在流行于各省及海外之客家话，原为华夏族之一方言……推测客家话应在秦一统以前已形成之方言，似为战时赵之方言。”^⑦这就是说，客家话不是中原南迁后才形成的，而是在南迁以前就形成了的。嘉应大学陈修先生则进一步提出：“客方言就是属于方言民系团内部的交际工具，换言之，客方言保存了周秦上古语音，其民系不可能在周秦以后形成。……研究客家民系发展形成，首先要从方言的形成上去着手。”^⑧此说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再推前至秦代以前。

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撰文说：“自唐代末年至南宋末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客家先民陆续从中原来到武夷山段，在闽、赣、汀三江之源的青山绿水间生息了四百多年。……客家先民就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子孙、继续沿袭着中原祖居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域。”^⑨此说把客家民系定在唐代末到南宋末逐渐形成，比罗氏提出的宋初推后了 300 余年。

台湾《客家风云》第 12 期刊载的《客家民系之形成及其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一文提出：“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与其名称之确定，当在宋末元初之际。”旅美终身荣休教授、哲学博士黄开禄先生（原籍蕉岭县徐溪乡）亦持此说，认为“嘉应州区居民之称为客家人，当在宋末元初时期”^⑩这一看法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再推后至宋末元初。

江西大学历史系万芳珍、刘纶鑫先生则认为：“‘客家’是指明、清时由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大批外迁移民。”此说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再推后至明清（主要是明中叶后）时期^⑪。

上述各种说法，见仁见智，不必忙于下定论。本人认为，民系是一个有独立特点的种族集团。他的形成须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素质等要素。客家民系的独立特点，被认同的是讲同一家方言，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如耕山，“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即此生活之映），有刻苦耐劳、开拓进取、崇先报本等精神，其地域集中在闽粤赣边区。在五代至宋初形成客家民系的罗氏之说，显然是说得太早了。秦代以前就已形成客家民系之说，更是缺乏根据，事实上秦代戍卒和迫迁之民，绝大部分形成了广府民系，成为客家先民的只是少数。唐末至南宋末，在闽、赣、汀三江之源地域（即闽西、赣南以至闽粤赣山区）逐渐形成客家方言及保留中原文化习俗。我认为这只能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初级阶段，远未正式形成。南宋末，客家先民再一次

迁徙,持续时间较长,到达迁入地的时间不一,至元初,仍不可能很快形成一个种族集团。因此,把客家民系形成定在宋末元初也嫌早了些。现梅州地区各县客家,有“先客”、“后客”之称。南宋以前迁来者为“先客”,元以后迁来者为“后客”。

南宋以前,梅州地区极不稳定,虽有一些汉族人迁来,但为数不多。据《石窟一征》载“镇平无北宋以前先客……今邑中旧族,南宋来者亦复寥寥。”^⑫

南宋末,元兵南侵,原梅州先客被杀或被迫转徙他处,致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先客锐减。元后,地广人稀之梅州,遂成为客家再一次转徙之目的地。“地为之虚,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⑬又据《崇正同人系谱》云:“梅州民族,当宋末元初之间曾经一度更嬗,而能为今兹之繁盛者,殆由元、明以来再从汀、赣二州源源而至,是则此为后客。”^⑭再据新编《蕉岭县志》记载,经调查,蕉岭全县共87姓,宋末元初迁来的以文天祥的参军丘文兴开基文福乡为最早,在元代逐渐迁来的还有王、邓、古、许、徐、钟、赖、黄、张等九姓,其余约90%的姓氏皆由明初陆续迁来。又据光绪《嘉应州志》称:“客人来州,约在元末明初。”

可见,在元末明初,客家先民继续迁徙,多从福建迁出,大量移入嘉应一带,逐步形成以中原文化及其古音为特征的“反客为主”的典型客家语系地区,从而使嘉应地区成为客家的腹区。从此,闽、粤、赣三省结合地区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这块地区(闽西、赣南、粤东)的客家人,逐渐自觉地把自己和他人(广府民系、福佬民系等)区别开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稳定的种族集团—客家民系。因此,可以认为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与其名称之确定当在元末明初时期。明中叶以后至清代,客家民系趋向成熟,继续向各地(包括台湾、海外等地)扩散。

(三) 是否操客家方言是界定客家人的主要依据

什么人可称客家人?其界定依据是什么?李逢蕊先生在《客家人界定初论》中所下的定义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⑮该文还强调独特稳定的群体特征有许多复杂问题,如分布世界各地客家人的变化情况,就难于说准确。

何谓稳定?稳定是相对的。客家人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不变。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构成客家人的因素将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受到世界潮流的冲击。由于战乱、灾荒或从商等种种原因,客家人常常反复转徙。上面已谈及粤北客家人由珠玑巷徙至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的语言由客家话逐渐变成广州话,他们由客家人变成广府人的事实。清代乾、嘉以后,惠州、兴宁、五华等县客民,目睹广州工业发达,试往经营,获利后,此三县接踵前往者数万人;梅县、大埔、蕉岭客家人,见汕头商业市场繁荣,有不少便迁徙该地从商,逐步成为汕头工商的大户。这是客家人由山地走向平原,由平原走向都市发展的重要过程。这些人在与广府人或潮汕人杂处中,经过若干年数传以后,语言和生活习惯被当地所同化,由讲客家话变成广府话或潮州话,籍贯也已变成广州人或潮汕人者,当然不能再称为客家人。其中亦有稳定者,如“番禺县大岗镇毗连的客家村民,乾隆七年迁此,世代开山采石……该县化龙镇与新造镇之间的‘东庄’和‘新旧庄’,近200户,居民都是客家人,他们离村讲‘白话’、回村讲‘客话’,对来村的干部并不讳言自己是客家人。”^⑯这些由客家地区迁去,至今时逾200余年,仍保存客家语言和风俗的人,虽然其群体很小,亦是地道的客家人。

台湾客家人,据知有560万人,他们是从大陆迁去的。如蕉岭县,清嘉庆以前入垦台湾的就有33姓、480多户,同治、光绪间又有大量流入,分布在台湾14个市、县,76个乡镇。子孙繁衍的结果,祖籍蕉岭县的台胞迄今达40多万人。据该县不少族谱记载,其祖先因避战乱或天灾,集合家族、亲邻作集体式的向台湾迁徙,先后定居于新竹、桃园、苗栗、高雄、屏东等县,开基后仍整体居住,繁衍一二百年,仍用客家语言,并保留其中原礼俗及人伦道德风范。据了解,今

天台湾的新竹、桃园、苗栗、高雄、屏东、花莲等六县居民，客家人占多数，多操客家话，长期保留了中原礼俗。这些居民是地道客家人。但是，生活在台北县、彰化、南投、嘉义、云林、台南市、澎湖等地居民，不少祖宗是客家地区迁来者，因当地“福佬人”多，生活在“福佬人”居住的环境中，数传以后，语言、风俗皆被同化，不懂客家话，只讲闽南话。此类乡亲，尽管祖籍是客家，但已被同化，似不能称为客家人。

客家人在清代，还大量向南洋群岛、欧美等世界各国迁徙，因各国、各地区的政治、法律、教育等限制，使这些客家移民在语言、文字、习俗、籍贯的选择上多不能由己。客人之移居海外者，必须以华语或洋文为立身立业之基，因而其子弟不再用客家话。据黄开禄博士称：“新加坡的华裔公民，占其全国人口近七成……其在1950年以后出世者多不懂客语而讲普通华语；其在1960年以后出世者，其英文已远超华文、华语程度。即以客家子弟论，其能操客者恐未及千分之一。今看在印尼的华裔公民，1960年后出生者，概不识华文、华语。”^⑩可见客家人在国外更难稳定。一般来说，不会讲客家话的，其祖籍虽是客家地区，也不能再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的后裔自愿参加海外客属团体者，尽管其对客家话不太熟悉，仍可承认其为客家人。海外华侨或外籍华人，凡祖籍是客家地区，仍能操客家方言者，当然是客家乡亲。

关于客家人界定的依据，可以多样，其中，语言是主要的。今天，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是否操客家方言作为界定是否客家人的主要依据。

注释

①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第43页。

②陈乃刚：《岭南文化》第184页。

③④据新编《南雄县志》第121页。

⑤⑦黄麟书：《北筑长城志戍五岭之秦始皇》，刊于1965年10月香港《珠海校刊》。

⑥饶颖奇：《汉族的主流—客家民系》，1972年台湾历史博物馆编印。

⑧陈修：《谈谈客家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刊于《客家文化研究》1990年第一集。

⑨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客家源流考察纪行》，刊于新加坡《客总会讯》1991年总22期。

⑩黄开禄：《论二百年后之客家人》，刊于1986年《旅港嘉应五属同乡会三十周行纪念特刊》。

⑪万芳珍、刘纶鑫：《客家正名》。刊于《中国客家民系研究》1992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⑫黄钊：《石窟一征·教养篇》。

⑬据《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

⑭据《崇正同人系谱》卷一“源流。”

⑮李逢蕊：《客家人界定初论》，刊于《客家学研究》第2辑。

⑯侯国隆：《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增补资料》，刊于1992年第3期《广东史志》。

⑰黄开禄：《谈太空时代之世界性客家人》，刊于《台北市嘉应五属年刊》1990年总第4期。

●本文作者系蕉岭县地方志办公室方任、副研究员

（本文选自严峻主编：《客家人面临时代挑战》——“客家人与当代潮流”论文选集。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1994）

二、客家三论

崔 灿

近年来，国外的客家人通过多种渠道在大陆寻根问祖，形成了寻根问祖热，与此相适应，大陆近年对客家问题也引起重视，有关的讨论也活跃起来。

本文着重探讨客家人的来源和主要特征，现从历史、语言和民俗三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一）历史来源

首先从历史方面来看，客家人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民系。对于形成这支民系的历史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学者着眼于移民数量，他们认为：凡是大量军队开赴南方戍边、征蛮，或大陆士庶南移，并留居南方诸省者，就会形成客家民系。例如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曾于公元前 219 年遣屠睢率 50 万大军戍守岭南，秦朝灭亡后，这些军队就地落户，他们认为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最早的一批客家人。其实不然，客家人的形成，不决定于移民的数量，而是要看它是否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经济生活等条件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方言、风俗习惯、经济生活、精神气质……，形成了以上特征，他们就变成了客家人，未形成以上特征，他们就成为其他地方化了的汉人。秦始皇由中原派到岭南戍边的 50 万军队，留住南方，转军为民之后，他们没有被迫到山区或丘陵地区聚族而居，而是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处。这样就根本无法形成客家独特的地域、方言……，但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生产水平较高，在开发岭南、同化百越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终于同当地的百越一起变成了具有南方特色的广东汉人。有的学者又着眼于移民地点，他们认为凡是由中原大批南移的军队、士庶、留居南方，就会形成客家人，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历史上大批南移并留居南方数省（含东南、西南）的中原人，次数相当之多，由于中原战乱频繁，有据可查的就有十来次，初唐时期的陈政、陈元光父子，晚唐、五代时期的王潮、王审知兄弟，他们都曾带领大批中原将士入闽。陈氏父子曾在闽南居官多年，政绩卓著，陈元光被漳州人民奉为开漳圣王，立庙祭祀，其影响之大，显而易见，所带大批军队也都留居闽地。王审知曾在今福建省建立闽国，称闽王，所带大批将士也不曾回归中原，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被迫聚族而居，无法形成客家人的种种特点，终于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福佬”。

由中原大批南迁并定居的军队也好，士庶也罢，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客家人，必须经过特殊环境的艰苦磨炼，熔铸成客家人必不可缺的基本文化类型与精神品德，其中形成客家人的物质基础是南迁的中原汉人的特殊环境，从史志和客家人的家谱记载来看，南迁的中原汉人有许多并非一举到达今日的居处地点，他们往往是随着异族入侵的步步进逼而节节南移，其中有的是达官权贵，于是他们携家带着先将郡治、县治侨置于黄河或淮河之南，再迁徙侨置于江左或江右，然后抛官弃爵，转辗流徙，最终定居于粤东、闽西、赣南等地；另一部分是名门望族，他们虽无官爵，但有威望，于是在异族入侵时就带领同族人历尽艰辛，节节南迁，最后定居。还有一部分人既无官爵，又非望族。因惧怕异族蹂躏，毅然背井离乡，跟随名门望族，漂泊异地，依附于他们生存度日，以上三部分人到达南方或东南、西南各省，原有城市或富庶的乡村已为当地土著居住，难以插足，只有被迫到无人居住的荒山或丘陵地带独辟蹊径，于是他们就依山临水，筑起大型圆型或方形围屋聚族而居（间有异性依随），开辟田地，挖掘沟塘，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存发展，并由此而孕育出客家人的独特文化类型与精神品德，形成了一支汉族独特的民系——客家人。

根据形成客家人的客观条件，我们认为历史上中原汉人大量南迁，与客家人有直接关系的为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晋朝“永嘉之乱”时期。“永嘉之乱”引起异族入侵，公元311年匈奴贵族刘曜率兵破洛阳，俘怀帝，纵火烧掠，杀戮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洛阳等地的衣冠士庶大批南迁，这批南迁的中原汉人，先入江西，后转闽粤，最终多数定居山区丘陵地带，成为最早的一批客家先民。

第二次是唐末“黄巢起义”时期。黄巢起义之后转战于南方和东南数省，最后下洛阳，破长安，中原权贵豪门多逃亡于江西、广东、福建等地，最后定居于山区丘陵之中，成为较早的一批客家先民。

第三次是宋朝金人入主中原和元朝建国之前的时期。此期中原大批汉人先迁到江浙一带，继又转至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史书、志书记载来看，明初中原汉人数量锐减，村落萧条，土地荒芜，生产急剧下降，有的乡村十室九空，多数乡村人口只剩下十之四五。致使从洪武之后，不得不从山西省多次向中原大量移民。这次中原汉人南迁数量之多，途中所受颠沛流离之苦，比前两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此，客家人在闽、粤、赣人数倍增，文化类型和精神品德臻于完备。

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形成客家民系，主要有以上三个时期，至于明末清初满人入侵时期，虽然也有中原汉人南迁，或由临安等地再迁的现象，但为数不多，对客家人的形成影响不大，倒是此时期由于海禁大开，客家人人丁递增，土地瘠薄，为了求生，漂洋过海到港澳台以及东南亚诸国当劳工、做生意的人大量涌现，应该说这是客家人向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不属于客家人的形成时期。至于咸丰年间广东西路发生的土客斗争，一方面造成了客家人的大量伤亡，另一方面迫使广东的客家人向广西等地大量迁徙，这次土客斗争使得客家人分布更广，但对客家人的形成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综上所述，客家民系形成的客观条件，主要是中原汉人南迁到闽粤赣等省山区或丘陵地聚族而居，形成的历史时期，主要是自晋朝“永嘉之乱”至宋朝人入主中原及元朝建国。

（二）语言特点

从语言方面来看客家人的宗亲意识和乡土观念特别浓厚，这种意识和观念表现在语言方面相当突出。他们有句流行的谚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在他们看来，忘了祖宗言，就意味着忘本。因此，不管他们周围的人说其他民族语，还是说汉语的其他方言，他们则坚持说客家话。全家侨居国外，要保持祖宗语言代代相传，一个人旅居异国他乡，也不能忘掉祖宗语言。客家人与客家人相见，如果共操客家方言就倍感亲切，得到认同，如果说别的语言，同乡人的亲切之感就无从产生，更不能得到认同。一个人长期出门在外，往往要说普通话或异地语言，一旦回到家里就必须重操母语——客家方言。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中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诗如果用来表示客家人游子保持母语的愿望，我看是再贴切不过了。可见客家话较少变异，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客观上保存了古代中原汉语的基本面貌。

那么，客家话保存的究竟属于古代哪个时期、中原哪个地点的汉语的基本面貌？学术界的看法颇不一致。

关于客家话反映了哪个时期的古代汉语，番禺陈京卿曾说：“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与林太仆所谓合中原之古音隐格符契。（见《光绪嘉应州志》温仲和按语）陈运栋先生认为：“现在客家话里的韵母系统，毫无疑问是成立于宋代。所以后来元朝周德清所撰的《中原音韵》，和明代初年修的《洪武正韵》，大体上都和客家音系相符。”（见陈运栋《客家人》）

以上两种说法颇有代表性，也有一定道理，如前所述：中原汉族大批南迁。形成客家民系，是始于晋朝“永嘉之乱”，终于宋朝金人入侵和元朝建国。隋唐与晋朝“永嘉之乱”相距不远，“永嘉之乱”时中原衣冠士庶大批南迁，将中原话带到了闽、粤、赣等地，基本保留至今，自然

比较合理，宋朝金人入侵中原，南宋偏安一隅，金人渡江作战，迫使南宋节节败退，此朝中原汉人又大规模地逐步南逃，他们把宋朝语音带到了南方和东南方诸省，聚族而居，保留了中原古音，也极有可能。若能语音系统相对照，我认为客家话基本上保存了中原汉语中古音的语音系统，既然是基本上，就说明客家话在汉语中古音的基础上有变化、有发展，比如调类，中古音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今以梅县为代表的客家话，平声分化成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保持不变，入声分化成了阴入、阳入，调类上增加了两个。

客家话保存了哪个地点的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学术界的意见比较一致。林太仆认为：“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其语言多合中原之音韵。”（光绪《嘉应州志》温仲和按语引林伏仆《客说》）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客家人原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实在是一种官话，像中州河南的话。”（韩廷敦《种族的品性》）狭义而言中原泛指河南。可见林太仆、韩廷敦对客家话反映了哪个区域的语言，看法是一致的，即客家话保存今河南的古音。但是，他们所说的客家话是指其语音。语音系统隔县而异，我们必须反映它的范围限定得更小些。有人认为所谓中州（与中原同）音、中州话是郑州土话。这种土话与现在的客家话非常相似，这是一种误解，也可能包含着对河南省郑州的偏爱。郑州在建国前和建国初只是一个不足10万人的小市镇。本世纪50年代初，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以后，郑州市才逐渐成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据史书记载，在隋、唐、宋时期，郑州在河南省的地位并不重要，其语言在全省的影响也很小，古代在全国和河南占据重要地位，语言在全国也影响较大的是洛阳，洛阳为九朝古都（加上陪都，为十三朝古都），名扬海内，古称河洛，由中原迁往闽、粤、赣、湘等地的人，他们自称河洛人，他们把自己所说的话叫河洛话。另外，中古时期我国最有影响的一部韵书是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切韵》反映的语音系统，语言学界说法不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周祖谟等经过考证，认为是洛阳音系，据此，我认为客家话所保存的是稍有变化的洛阳音。

（三）风俗流变

古书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说明风俗因地制宜。客家人由中原辗转流徙，远途跋涉两三千公里，其风俗难免发生变异，再加上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改变，风俗的变化就更明显。但是，客家人的风俗不论如何变化，其基本内容却万变不离其宗，有些即使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它与中原风俗的某种联系。从风俗的流变，也可以说明客家人的祖根在中原，下边撮其要者加以分析。

1、敬祖孝亲

敬祖孝亲及中原古风，这种古风一直保留至建国初期，有的至今未改。旧时中原名门望族，多设有神主（也叫“木主”），民间的祖主是以木牌立于宗祠，无宗祠者立于家室。木牌形状狭长，下有底座，正面竖写祖宗姓名，有的尚有官职、谥号等。如鄆城县邵陵乡许慎故里林庄，建国前即有许慎的祠堂，内设神主，定期隆重祭祀。辉县市百泉村为宋学家邵雍（号康节）的故里。村的祠堂至今完好，逢农历七月初四邵康节生日或十二月二十五为邵卒日，邵姓即聚族禁香设饌祭祀，一般族性祭祀祖先的活动，多在岁时节日进行。凡农历正月元日，或设祭于堂室，或点灯设饌于坟茔；清明时节，中原家家户户普遍上坟祭祀，如果是近亲新坟，除烧纸设饌外，还要哭拜；农历十月初一，要去坟茔供酒食，烧五色纸，俗称送寒衣；农历七月十五，也是中原群众所说的鬼节，祭祀虽不及上述节日隆重，家家户户也要上坟祭祀一番（有的县祭祀十分隆重），孝敬双亲，也是中原古风，家内如果设牌位于中堂，则写“天地君亲师之神位”，成年人结婚，要在“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前边“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儿、女、媳妇如果对父母（或祖父母）不孝，古代就要受到家法的责打，现代也要受到家庭的干涉和舆论的谴责。

敬祖孝亲的中原古风，客家人得到了继承和强化，闽、粤、赣、港、台的客家人，定居某地

后多数要建造客家大屋，聚族而居，客家大屋高大雄伟，中轴线上为正厅，正厅供奉列祖列宗。每逢春分、春节、清明等全族人设饌烧香，虔诚祭祖，连涉外游子也要设法赶回来祭拜，他们祭祀的祖宗多为带领他们离乡背井，到达当地开基立业的先祖。不少大姓尚有祖训，族人对祖训视为金科玉律，尊奉祖训生存发展。如：宋朝黄氏第119世峭山公为他21个儿子留下的祖训是：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纵胜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惟愿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可见祖训中既有对上天的祝愿，又有对子孙的教诲，而且颇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客家人不但有祖训，而且还有祖上留下的族规。族规虽不成文，不是法规，但族人必须遵守，违犯族规者，轻则受到族长训斥，重则受到族人孤立，或更严重的处罚。

孝亲敬老之风，客家人尤为盛行，这表现在诸多方面：首行，过春节子女要给父母和其他老人拜年，住房要让老人住主房，吃饭要让父母坐主席，子女不但要赡养父母，而且还必须替父母抚养弟弟妹妹，生产方面的种植、收获等大事，要由老人议定，调解外部纠纷或对外交涉，均须老人出面，老人亡故，子女必须依礼埋葬。

综上所述，客家人敬祖孝亲之风，承继中原民俗，并发扬光大，有所强化，其所以如此，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客家人为避乱被迫南迁，途中受尽了重重苦难，每克服一重苦难，族长与父母亲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定居之后，重建家园，开基立业，垦荒造田，养育子女，这一切都离不开族长和父母亲的辛勤劳动。客家人为求生存发展，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一个大的家族或村里，就要兴办一所学校，学费由族田提供，族人捐助，族长和父母含辛茹苦，也要设法让子女上学读书，子女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一切全是族亲和父母给予的。所以他们与族亲和父母的感情格外深厚，敬祖孝亲已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2、耕读为本

中原古风，以农为本，以读为荣，所以以吉言嘉语书写的楹联有：“霜熟稻粮肥，几村农喝；灯红楼阁边，一片书声”，横幅则为“耕读传家”。雍正《河南通志》洛阳风俗载：“古向诗书、民习礼仪、务本立业、有周召遗风”。又本志光州风俗载：“俗美风淳，异才秀民、业儒术以自见于世，士尚外教、礼崇俭约、古意未漓，少长安以朴俗，衣食给于田蚕。”洛阳风俗中的“条本”，是指以农为本，光州风俗中的“依食给于农桑”，是指男耕女织，以供衣食，仍是以农为本。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但是广大农民之本，也是国家之本，抓住了这个根本，人民就可以丰衣足食，生活安康；国家也可以仓廩充实，根基巩固。这种以农为本的指导思想影响十分深远，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自然要重农抑商，把商业甚至手工业都视为末作，加以抑制。重农抑商的事例，历史上屡见不鲜，正由于这种指导思想根深蒂固，才延缓了我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读书也是中原广大人民十分向往的。但是，由于中原战乱频繁，灾荒连年，广大劳动人民缺衣少食难得温饱，荒年暴月则流离失所，饿殍载道。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劳动人民及其子弟虽然向往读书，却可望而不可及，读书遂成少数人的专利。

客家人经过辗转流徙，定居于赣南、粤东、闽西等地，他们为求生存，重建家园之后第一要务即开山辟土，引水种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继承了中原以农业为本的思想。光绪《嘉应州志民俗》载：“民俗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瘠民贫，尚气轻生”据史料记载与调查所得可知，客家人定居上述地区，多属不毛之地，加以人多地少，虽经精耕细作，日夜操劳，仍然难得温饱，于是，他们认识到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地位。必须设法学习文化知识。这当然受了孔子“学而优则仕”，以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思想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客家人经过千里跋涉，重重苦难的磨炼，不甘受生活的罢弄，增强了求生进取精神，他们经过磨炼

克服了原有的保守性及奴役性，学到了积极的抗争性与革命性，基于这种抗争性与革命性，客家人办教育的热情源于中原，而又极大地超过了中原，中原人办教育，无论是官办或民办，绝大部分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人，入学的一般都是封建贵族或富人子弟，贫穷农民的子弟则被拒之门外，客家人办教育是博施于民，只要是同宗同族的子弟，不论贫富一律收授，学费由族长筹集，具体来源，一是公共田产的收入，一是有钱人的捐赠。客家人有个优良传统，他们旅居外地一旦发了家，则捐赠大量钱财，让祖籍办教育，这种传统美德形成已久，以后则蔚然成风。据史志记载：客家人为了自卫、抗争，每定居一地就建造大型防卫式土楼，聚族而居，存亡与共，每一座土楼内都有一所自办的学校，同族或同乡人的子弟均可就读，所以客家人文盲很少，随着多年的文化教育积累，整个客家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上世纪末，法国天主教神甫赖里查斯曾在梅县传教多年，对梅县的一切颇为熟悉，1901年著有《客法词典》，在这部分的自序中作者曾说：“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地，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所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实，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赖里查斯这段话，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梅县的教育情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客家之乡梅县改成了梅州市，梅州市的教育跨上了新台阶。校舍建筑和师资、设备，梅州市的中小学居全省，及至全国的领先地位，而且全市不但有了数量多、质量高的中小学，最近还兴建了一座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的新型高等学校嘉应大学。耕读传家一向是中原先人的美好理想，由于种种原因终成泡影，中原迁往南方的客家人把中原先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综上所述，客家人其浓厚的宗亲意识和乡土观念，保存了中古时期的洛河语言，正因为如此，客家人听到了河南话，就好像听到了老家话；见到了河南人，就如同见到了故乡人。

从历史到语言，以及文化类型、精神品德，我们都能找到客家人和河南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从中原人几次南迁之日再往前追溯若干年，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河南人与客家人本是一家人，东晋之后，战乱、征讨、贬调、饥荒，把中原的一部分汉人推到了异地他乡，迫使他们在艰难困苦之中求生抗争，奋发图强，创造了灿烂光辉的前程。回首往事，抚今追昔，海内外游子思亲怀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如今，千万个客家同胞远涉重洋，回归故土，寻根问祖，将以艰辛与欢乐，以怀念与向往凝聚而成的深情厚意，倾洒给中原大地的故土宗亲。

●本文作者系河南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选自严峻主编：《客家人面临时代挑战》——“客家人与当代潮流”论文选集。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1994）

三、梅州客家迁徙及其经济综述

张梓林 黄顺昌

客家迁徙与梅州客家经济文化

古往今来，客家崇尚文化、兴学育才，蔚成风气，倍受赞誉。《国际百科全书》中评曰：“客家……教育普及，在中国为最”。就梅州而言也是如此，孙中山曾称赞：“梅县地方人才辈出，名

不虚传”。敦洙若诗赞梅州“文物由来第一流”。究其原因：一是客家远祖，多为仕宦之家，书香门第，有血缘遗传和受家庭身世环境的影响；二是推崇儒学，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三是身处山区、环境艰苦，男子追求知识渊博、学问高深，以志入仕途发达或贾于四方谋业。甚至客家女子也读书求学，争做有文化的客家妇女，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他们坚持破除女子缠足依赖的陋习，做知书识礼，能耕作、善纺织的劳动者。近代客家妇女追求解放，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的“半边天”，挑起劳动生产，家务料理，养男育女，教子成龙的重担。“孩儿要读书、农家要养猪，养猪积钱筒，读书有前途”。这首民谣反映了客家人的文化心态。

梅州因其特殊地理条件和客观环境，成为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汇点，孕育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中心。使梅州成为“人文秀区”。但是，在此同时，也产生了重文轻商、重农轻工、忽视经济的思想，使大多数客家人成为封闭型的小生产者，限于“田头地尾、村头寨尾，家头窖尾、灶头锅尾”的谋生觅食之人。一些豪杰英才也只是戎马刀枪的好汉，就是一些衣冠楚楚的文人志士，在他们的撰著贡献中，多是表现人文地理、山川锦绣及文化艺术、诗歌、医学题材，很少见到表现工商、反映现代经济的作品。可见，历史上的梅州，在浓郁的“客家文化”氛围艰难中，缺乏发展经济、研究经济的气候。因此，身处穷山僻岭的客家人在耕作、谋生不易，生活窘困交迫中，加上人口膨胀的困扰以及政治迫害等原因的驱使下，在外界发达商品经济现状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诱惑下，梅州客家便随之发生一次次新的迁播。

晚清年间，客家民系发生新的迁徙。这次迁徙一改过去单纯南下，入山务农，求栖身为温饱的状况；而是在客家集结地（尤其梅州）的客家人，走出穷乡僻壤，迁入国内其他山区的开发，务工从商；有的远涉重洋，走向东南亚岛国及世界五大洲各地，在异地他乡落脚生根，披荆斩棘，艰辛创业，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击搏。这一时期的客家迁徙的方式和取向是：

（一）梅州客家人向台湾、四川等地迁徙。据传朱德元帅的祖先就是从嘉应州五华县迁至四川仪陇县的。台湾版《客家人》书载：乾嘉年间，台湾客家人口不下10万，其中嘉应州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县迁来的，占有一半，而又以蕉岭为最。著名抗倭保台人士丘逢甲的祖先丘仕俊，就是在公元1616年举家从蕉岭东渡台湾彰化，垦荒定居的。尔后，其他蕉岭人及尾至客家人，随之迁入。经几百年繁衍，现在台湾客家总人数已达500多万人，其中祖籍蕉岭的共有40多万人，分布有全岛12个市县、72个乡镇，比现在蕉岭县的总人口多一倍。台湾客家人对台湾北部的开发及今日台湾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二）粤东、粤北地区客家人向珠江三角洲地带迁徙。清雍正年以后，我国兴起对外通商，促进了番禺（今广州市）的经济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带的发达交通，使番禺成为工商兴旺，商品经济繁荣的城市，它有力地吸引着久居山区的客家人，使梅州、韶关、惠阳等地客家人纷纷向此地迁移。据史料证实，农民起义的首领洪秀全的祖籍就在梅州，他的祖先从梅县石扇镇移居花县的。

（三）嘉应（梅州）客家人向潮汕地区迁移，向海外迁徙。随着潮州、汕头的水路交通的发展，韩江上游的梅县、大埔客家人与潮汕沿海地区交往增加，彼此楫舟往来，十分方便。潮汕地区的工商发达和经济发展，吸引着客家人，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封闭生活和窘闭境地，有的只身而去，有的携家迁移到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汕头、潮州打工、经商谋生；有的由小到大发展成为有实力的老板、新贵。移居潮汕沿海的客家人勾通家乡与外界的联系，为客家山区引进潮汕的先进耕作技术和商品经济意识，推动了梅州经济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我国陷入国破民穷之困境，客家地区刚刚兴起的小商业、小手工业又受到扼杀，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者多。而汕头成为对外商埠后却更加繁荣兴旺，与海外通商通航十分活跃。从19世纪末始起，梅州客家青壮年一批批离乡背井，

经汕头或广州港口群起出洋，掀起一次次“过番”浪潮，直到20世纪初为鼎盛时期，期间，有的聚众结伙，驾舟漂泊出洋，那里落脚，那里生根；有的充当“契约华工”（即“卖猪仔”）卖身出国谋生；有的是亲友资助引带去“番邦”或“水客”携带出国定居。其中以“水客”（即往返在海外与家乡联络的客籍中介服务人员）携带新客出洋最为活跃。据1940年《梅县要览》载：梅州出洋“水客”700多人，每人每年带出洋新客几十人。因此每年梅州“水客”引带出洋的新客近万人。据老“水客”谢纪秀忆认，他从业20年共带出洋新客有2550多人。据统计，梅县隆文镇有华侨、华人13000多人，其中70%左右是亲友或“水客”引带出去的。这一时期从梅州客家大本营播迁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在东南亚、世界各地，据《梅州侨史》1988年资料统计：梅州客家旅外华侨、华人有450多万人，其中马来西亚有100万人，新加坡50多万人，印尼、泰国各有45万人，仅美国檀香山一地就有1万客家人。他们有的是穷则思变以图闯出活路的硬汉，有的是勤劳俭朴的工艺人，有的是有文化而富经济头脑的精明人，他们认定异乡外域好做食使，决心“捆条裤带出站去，串（赚）到银钱回家乡”漂泊异邦，落地生根，务农务工，经商做生意，在西方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的汪洋大海中艰苦奋斗创业进取，发迹成家，为彼地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旅外客家人都是怀乡念祖，爱国家、爱客家，一往深情的。不管是大富大发的侨贤、侨领，还是艰辛渡日的侨民都是心系乡梓，情恋故土，思念亲人的。“异域番邦有金山，赚到金银转唐山，番邦赚钱家乡使，乡亲父老笑开颜”。这首山歌充分描述了客家侨胞的心态。

数百万移居海外的客家人，用血肉之躯苦心经营，展业宏图；同时与居住国家的国民一道遵纪守法，和睦相处，团结奋斗，出现了一批侨贤、侨领及华侨实业家、工商界巨头。他们为居住地的独立富强经济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梅县石扇罗芳伯赤身到坤甸（今印尼）几十年艰苦创大业，成为巨商阔富。他与当地人联合创立经政合一的“兰芳共和公司”被选为“大唐总长”（又称大唐客长）。近代侨贤平远县华侨姚德胜，19岁孤身去南洋，在马来西亚当矿工求生，后来群工经商，从做豆腐卖馒头，到开设杂货店，投资开发锡矿业，成为声贯全马的矿业首富，众人尊崇信赖的侨领。他先后营建了“姚德胜街”和“姚德胜市场”，使贻保市成为现代商埠，当地人民以“前无古人”的殊荣赞誉他为姚公。还有创制名酒“金奖白兰地”的大埔县华侨张弼士、梅县的张梧轩、张耀轩兄弟等都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中的代表。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人心不安，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梅州客家人处于“居家难糊口，出外多艰辛”的极度困境之时，“过番”的客家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苦苦谋生的同时，积蓄钱财，承担赡养父母，资助家乡妻儿老小。他们利用还乡或是“水客”往来频繁的机会，把侨资、侨汇输入山村，把洋物、洋货送进客家，给封闭的客家山区带来外部世界的经济信息、先进技术和商品经济意识。因此，灾难的客家地区出现新的经济生机，发展工商经济的风潮乍然而起，在客家的各县县城及各大圩镇成为商品交流、集市贸易的要地，有些地区办起了一批作坊式小手工业、开设了商店、茶楼、酒馆服务业，兴建电厂，纺织业更是飞速崛起，如兴宁县的城镇、乡村，户户摇机、家家织布，盛产“灰葛”、“三义白”、“蚊帐纱”等耐穿耐用的家机布，销往江西、福建全国名地和外销东南亚各国。有的兴宁人肩挑一担竹箩，腰扎一条裤带，来往江西，福建经商为生，成为勾通粤赣、闽经济的商业使者和促进商品流通的生意人。推动了兴宁县的经济繁荣发展，使之成为工商兴旺、市场繁荣的闽、粤、赣边的经济中心城市，人们誉称兴宁县是商贾如云的“小南京”。综上所述，说明客家人的商品意识、市场经济观念在萌芽与发展。

历史上的香港属宝安县。据《客家研究》载：300多年宝安县有许多客家村镇。自香港割让给英国统治以后，城市建设加快，工商业兴起，市场经济繁荣，成为亚洲和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在这前后，梅州客家人大量涌入香港，尤其以五华县的打石、采石工艺人、兴宁县的纺织技工和劳工，以及经商人为多。他们有的在香港承接基本建设工程；有的经营藤椅业、纺织业、有

的开设饮食、药材、旅游、服装商行、商店，以及经营现代工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重要产业，其中商业为最。据统计：客家人在香港开设的国货公司全港共有160多家。由此可见，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凝聚了旅港客家人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一批批旅港的客家人，在资本主义浩瀚大海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以后，成为香港工商贸易的重要力量，对促进香港与梅州客家的联系、交流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代梅州客家迁徙及其经济

建国以来，梅州客家社会稳定，和平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再没有出现大的迁徙，但也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分散性的个别迁播或移居：一是读书成才或参军以及参加异地建设事业的外调，这是通过组织分配和调配走向全国各地的，如近年来，每年都有一大批梅州客家籍的大学、中专学校毕业生分配在外地工作；二是出国、往港澳定居。多数是以亲属、血缘关系，经申请批准出国留学或以继承财产而移居港澳及世界各国；三是以其他合法条件获准出国定居。上述移居港澳和各国的客家人，成为新时期一代旅外华侨、港澳同胞。他们多数人文化素质较高，客观条件较好，经济上具备一定的实力。他们发扬客家精神，发挥个人才华、聪颖，在新的环境里扎根展业，在世界经济商海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奋斗、抗争，使一批批建国后出国旅港的客家人成为出类拔萃的工商实业家，经济界铁腕人物，曾宪梓、姚美良、刘宇新、黄华、李茂林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曾宪梓生长在梅州，学成在广州，60年代迁居香港。他以过人的智慧，不屈的进取精神，在香港工商界异军突起，金利来、银利来名牌领带蜚声国内外，行销全世界。他已成为亚洲领带大王，誉为“海外杰出华人”。

移居海外的新一代、老一辈客家人及其繁衍的客属子孙，在新的迁居地里以客家话和乡土感情的相通，以地缘、人缘等无形的纽带凝结聚集成客家群体。客家人自愿组成的团体在旅外客家人较多的东南亚和世界各地都有。如新加坡客属总会、美国旧金山客家联谊会、香港嘉应客属商会等。这些客属团体为旅外客家人互相了解，互相促进、团结奋斗起着积极作用。

梅州客家人在外省外区工作及移居全国各地的人为数很多。如广西南宁一市就有上千人。他们大都集中在城镇，为了互通乡情，促进联谊，加强合作，自愿组成乡亲联谊组织，如北京、上海、广西等地都成立了梅州客家联谊会。事实证明，旅居国内各地的客家人身在外地，心系梅州，十分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有的人利用书信来往，为家乡亲人或政府传递交流信息；有的人通过行业对口联系、交流情况；有的利用出差或假期回乡，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家乡现状，为振兴梅州山区献计献策。总之，他们想方设法，致力为发展梅州经济服务，开展“智力支乡”提供咨询服务，“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实现“项目支乡”，引荐人才、项目、资金及科技成果、信息、促进商品流通，培育和发展山区市场经济。

当今梅州客家，依“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天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地利”是侨乡山区的资源优势；“人和”是关心家乡的人才多，迁居海内外的客家人多。事实表明，梅州客家人通力协作发挥“优势”，共同创造“政通人心齐，发展农工商，建设新梅州，共同奔小康”的新局面，梅州经济发展是有希望的。为实现上述理想，要使梅州经济有两个转变。

（一）冲破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束缚，梅州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以下略）

（二）梅州经济发展从单一经济向多元化立体式经济转变。（以下略）

●本文作者张梓林系梅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黄顺昌系梅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本文选自严峻主编：《客家人面临时代挑战》——“客家人与当代潮流”论文选集。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1994）

四、清代四川的广东客家人

刘正刚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历经战乱,整个社会十分荒凉残破。清初统治者面对战后“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①的四川,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垦荒措施,积极鼓励各省人民入川落籍垦荒,于是出现了清前期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广东客家人就是在此时大量进入四川的,且入川人数相当可观,如金堂县,楚省籍人约占37%,粤省籍约占28%,闽省籍占15%,其余各省籍共占20%^②;简阳县的粤省籍约占50%,楚省籍为32%,其余各省为18%^③。如此大规模的广东客家人入川,至今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就广东客家人的迁出地、入川动机、社会组织、农业生产活动等进行探讨,旨在抛砖引玉。

(一) 广东客家人的迁出地

清代广东客家人迁川的地理范围,主要分布在嘉应州、惠州府、潮州府以及韶州府和南雄州等客家集中聚居地。有关广东客家人迁川的迁出地记载,广东地方文献对此罕见记载,主要见诸四川省各地方志之中,且文献记录也十分零散,唯一例外的是民国时期编修的简阳县方志对此记载十分详细。兹据民国16年纂修的《简阳县志》卷18《士女篇·氏族表》和卷24《补遗·氏族表》以及民国20年纂修的《简阳县续志》卷10《士女篇·氏族表》统计,清代迁居四川简阳的广东移民共有261支,其中有明确原籍地名记载的为135支,分别为长乐73支,兴宁29支,龙川9支、和平6支、归善、河源各3支、嘉应州、新宁、连平各2支,大埔、永安、海丰、博罗、西宁、广州各1支。上述州县中,属纯客家住地的长乐、兴宁、龙川、和平、河源、嘉应州、连平、大埔、永安等共为126支,客家移民占广东移民总数的93%以上。据调查,今成都东山一带的客家主要来自广东的梅县、五华、和平、兴宁、大埔、龙川等地^④。

清初广东地方官员在上奏中也屡屡提及客家人移居四川的情况。雍正年间,广东肇罗道杨锡绂奏称:“去年清查入川人民,只有长乐、兴宁、镇平、平远、龙川、河源、连平、永安、和平等县。今则添出大埔、揭阳矣……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⑤。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称:“据乐昌县知县马燧具禀,该县地通湖南入川大路,如本省之广惠南韶等府,南雄之保昌、始兴各县入川之人,必由本县地方过楚入蜀等语”^⑥。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月,广东总督鄂弥达上奏:“更于入川要路,如惠州之和平、连平、龙川,韶州之乐昌、仁化各县多张告示”,劝阻民人入川^⑦。

族谱是研究广东客家人迁川的第一手较为可靠的资料,每一族谱对其家族的迁出地和迁入地都有记载,有的还十分详细,如宣统《陈氏族谱》载,其族入川祖陈绣尧于清朝雍正五年丁未岁(1727年)由广东惠州府永安县双下约归湖村堂肚里,“率同四云公等迁于四川省永宁道直隶资州内江县佃居崇林铺桂花湾”^⑧;又如民国《隆昌陈氏族谱》载:陈润吉于“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二月初九日自广东嘉应州长乐县曾大塘起程带已鹏振十二岁,二弟鹏扬八岁,三弟鹏

① 《清圣祖实录》卷36。

② 民国《金堂县续志》卷3《食货志》。

③ 民国《简阳县志》卷18《士女篇》、卷24《补遗》。

④ 钟禄元《成都东山客家人》,载《成都文物》1986年第3期。

⑤ 《四知堂文集》卷17。

⑥ 台湾《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

⑦ 台湾《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

⑧ 富统《内江陈氏族谱》(四川省图书馆藏)。